



我年轻的时候供职文联研究室,编一份“文艺汇摘”小报,这份小报是为文艺家提供文艺信息的。当时正值开放,主任王宁宇和当时文联领导储大泓先生提出能否增添一些外国文艺的信息。我与同室的小彭就去了译文出版社,当时汤永宽先生接待了我们,我们又去了外国语大学。为了获得更多外国文艺信息,我两次去了孙大雨先生家,先生白天睡觉,没碰上。

正是无巧不成书,搞德文翻译的钱春绮先生从静安寺的老宅动迁到大华新村,离市区远,少人交谈,我有空常去他家。那时师母还在,师母

又能画的一手好画,我去他们家他们很是热情。我那时正读普鲁士文史哲书,钱春绮对我讲了好多见解,我深怕忘了,回去以后做了记录,至今还保存着。并按照他的提供买了好多德文翻译书,当时买得一本“中德文学比较史”,钱老说这本书很有价值,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钱老从我的口中知道,我的深度近视眼就是读书读的,于是两人话题很多。有时我来,他放下手中午,坐在摇椅上悠闲地摇摆着,像孩子一样高兴,“这个时候是我开心的时候”。他总是讲些我从不认识的新见解,并将他翻译书送给我,“这本《海涅诗选》是新版的,而50年代出版的有插图,可惜被抄了”。他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收藏的书都在“文革”时被抄了。说着他把他的手抄本给我看,我十分吃了一惊,手抄本上记载的都是从中外书籍上抄录的句子,还有报刊杂志上的文摘。我睁大眼睛问,“这些文摘有什么用?”。钱老十分认真的对我讲,“写文章备用的,老了,记忆力不行”。这些摘录本好多本,蝇头小字,要知道这个时候钱老已经有了严重的心脏病。有一回我见他喘着粗气在改文章,便说,“休息一会”。他无奈地说:“别人催了,已经拖了一阵了。”望着他工作台是饭桌,堆满了书,只留一张纸的空隙上还在认认真真的写作。我一直记着这样的情形。

钱老终于心脏病突发,摔成骨折,孩子又在国外,我常去医院看他。后来我从他女儿那儿得知,钱老一生乐于助人,对家人、同事都是这样。那时他的兄长家庭拮据,钱老是医生,又是翻译家,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钱来接济他们。有一天钱老特高兴,他说他翻译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了,我前些时看了当时出版能购得的尼采的书,一一请钱老题了字,其中有一本书上题道:“因为同情具有了价值。”对他的这本书我也非常喜欢,并请钱老在扉页上题字,那天又是新春,他题了“孩子是新油的开始”,他说这句话很好。

瓷砚最早见于西晋,距今1700多年,晋瓷砚圆形有三足,周身设青釉,砚面无釉露胎,砚型无奇,但三足却有变化,有兽足型,有小熊驮着砚面的,还有三个力士驮着砚面的。由于胎泥细密,还很发墨。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杭州栖霞岭的山脚下,宾虹老的书斋中见到画案上就有一方晋瓷砚,足有大碗口那么大,是三个兽足驮着砚面,周身青釉,砚旁还有晋瓷水盂、晋瓷水勺,俱是周身青釉,再加上秦砖汉瓦所做的笔筒墨床,整个书斋的气氛那个安静雅致就难以言表了!后来在潘天寿潘老的画室中也见到过晋瓷砚,是放在窗台上,砚面不大,比宾虹老家的小一圈,上面养着一撮苍蒲,苍蒲周围用棕皮包着,翠绿可人,旁边配以拳石,也得一个雅字。



大千世界里,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我的爱物是德国伏伦达公司1933年出品的PROMINENT 6x9照相机。

四年前吧,对了,就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那一年,它寂寞地躺在老美的一家铺子里。其时我正在浏览eBay网,竟然一见倾心。那个可爱的美国佬还提供11张照片,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它的韵致和魅力。从它出生那年算起,现在近乎80高龄,按理说韶华已逝。从照片上看,相机的边角稍有露铜,烤漆微微发暗。但皮腔依然毕挺,包复在机身上的真皮光滑如新。岁月催人老,一架“骨灰”级古董相机历经

## 娇小可人的白釉多足砚

◆ 张大根

诸乐三先生也用晋瓷砚研墨作画,诸老说很发墨不易干,当时杭州晋瓷的水盂、灯台、砚台很多,我在吴山路旧货店也买到过一方小型的晋瓷砚,周身青釉,三足是三个小熊驮着砚面,很有趣。有人说这不是实用砚,是坑砚。

东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北方窑也出了很多瓷砚,釉色由青尚白,也有褐色釉,砚型虽也是圆形,但由三足变为多足,且砚足也变高了,使整个砚身有临空感,但由于胎土粗松,多数已不适研墨,实用性不高了,可釉色明亮了,砚足变化更多

了,一圈有四足、八足,最多有十足,极具装饰性,放在画案上非常养眼。

前几天去红雨楼造访富华老师,正碰上有人要富老在画册上题名,富老即打开砚盖研墨题字。我一看用的是晋瓷砚,周身青釉,三只兽足驮着砚面。我问富老发墨如何?富老说很发墨,他在国外20年就用这晋瓷砚作画,当时我心想用晋瓷砚研墨作画的也只有富老了。回家后我赶忙找我藏的一方小晋瓷砚,但由于事隔几十年,又经历了搬家没有找到,反而翻出了一方南北朝的多足白瓷砚,倒也好



玩,此砚砚面直径8.5厘米,高5.5厘米,底圈直径10.5厘米,周身白釉微泛青,有十条兽足驮着砚面,砚面露胎,娇小可人,反复把玩不舍研墨。此类多足瓷砚隋唐以后、五代十国即不多见,一入北宋就销声匿迹了。

## PROMINENT 6x9, 我的至尊相机 ◆ 蒋放



沧桑却有着如此完美成色,真不可思议!查阅资料,方知相机产量仅一万架。经过战争和灾难,它的存世量可想而知。它是当时制造成本最高、工艺最精、最能体现三十年代德国贵族气质的6x9皮腔照相机。每个零件每个细节都被打造得如此精妙典雅。我被它迷倒了。

可以想见,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方才把这个名贵尤物从美利坚合众国请进家门。

PROMINENT相机的规格是170(高)×77(宽)×37(厚)mm;重780克;HELIAR f4.5/10.5cm镜头为5片3组,是世所公认最佳素质的人像镜头;配置COMPUR快门,速度为1秒~1/250秒,B门和T门。机身两侧分别装有花篮状旋



钮,采用镂空滚花工艺,精美绝伦。那个稍大的旋钮用来对焦,较小的用于卷片。机门开启时,镜头在小链条和弹簧的张力作用下,缓慢地沿导轨前移,自动定位在无限远距离。相机顶部装了当时最先进的军用测距仪并采用裂像聚焦。测距仪的左右两端凸出于机身,形似古代女子的头簪。相机上装有圆盘测光表,外形华贵。测光时可以转动圆盘,并通过调整视窗里的纵向条纹以获取正确的曝光和速度参数。机身上另有四个气压释放孔,消除镜头弹出时机内产生的正压,防止胶片走动而影响聚焦精度。金属件表面多为镀镍,这是30年代经典相机的普遍特征。相机使用120胶卷,可拍8张6x9cm底片或利用所

附隔板拍16张4.5×6cm底片。此外,相机还配有一根手工编织的牛皮腕带,柔软细腻,实用装饰两相宜。至于相机的原配牛皮袋,同样为手工制作,外观庄重大气。对于这样一架代表了30年代德国最高科技成果的古董相机,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件超美的实用性艺术品。从上世纪20年代起,欧美诸多照相机公司以生产销售120折迭式相机为主。德国伏伦达这家历史最悠久的公司异军突起,于1933年推出该豪华版相机,独领风骚,彰显王者地位。

拥有了这架相机,装上一卷伊尔福黑白胶卷,以斑驳的老上海黑漆铁门为背景,为太太拍了一组人像。底片所表现出来的影调、层次、质感真是不错,完全符合相机原有特质,厚重、深邃、细腻。

我共收集了70多架德国老相机。其他相机都被置放在橱柜里,唯独将PROMINENT 6x9放在床头。把玩之余,感受它骨子里透出的那股精气神。它激活血脉,给我带来欣喜。

## 淄砚来自柳泉乡

◆ 孟祥海

淄砚始于汉,历史悠久。早在宋朝时,就与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州的歙砚、甘肃临潭的洮河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宋代米芾著的《砚史》一书中就记载过“淄州砚”,淄砚温润如玉,磨之无声,发墨光滑,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

历史上米芾、苏轼、司马光、纪晓岚等名人均使用过淄砚,并给与高度评价。当代许多文人也与淄砚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现代著名书画家费新我擅左笔书法,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为淄砚书写铭文:“历经沧桑

不计年,风风雨雨炼冥顽。一朝慧眼识真趣,常伴笔墨缙窗前。”还有一则淄砚铭为:“淄砚来自柳泉乡。”(如图)

舒同也曾收藏过一块淄砚,并



镌有铭文:“生齐鲁,若桐叶。临池比绿天,逸思出物外,伴诗书,春永在。”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所镌淄砚铭文:“秋谷畔,聊斋旁,历经沧桑炼冥顽;至南中,住江左,伴结园

林自得乐。”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书写的淄砚铭文是:“松龄聚脂,秋谷传声。红楼梦断,黄叶春回。”1978年秋,启功先生得一淄砚,十分喜欢,并为之铭曰:“锋发墨,不伤笔,篋中砚,此第一。得宝年,六十七,一片石,几两屐。”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幽默风趣,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淄砚具有“淄石有铜,足为是真,如金之声,如玉之润,研磨如锉,发墨如油,用手抚之,如婴之背”的美誉,如今“淄砚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淄博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更加广为人知。

一般说来,不管是贵金属还是普通金属材料铸造的纪念章是不能和同样材质铸造的纪念币相提并论的。每一枚镌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和币值的纪念币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并由国家造币公司铸造的,而纪念章是不允许刻上国名和币值的。纪念币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其审批、设计、工艺、铸造、销售等各个环节均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和规定,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严格控制,因此纪念币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和一定的升值空间。而各种材质的纪念章的发行、铸造、销售等就完全属于市场化的行为。

不过,我还是珍藏了三套伟人纪念章:第一套是单枚的Φ40毫米、3

## 三套伟人纪念章 ◆ 马蒋荣



毫米厚的铜质纪念章,正面图案是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书房里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握手的瞬间;背面的中间第一层是并排着的北京天安门和华盛顿白宫的图案,第二层是一组1972.2.21数字,这告诉我们那次改变中美关系史的会见时间是40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沿周边一圈的上半部分是中文“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半部分的“MAOZHE-DONG NIKESONG”是毛泽东和尼

克松的大写拼音字母。那时我们国家还处在“文革”中,由于美国总统的来访使普通老百姓看到了被人为隔绝了20多年的另一个世界。记得在单位里职工都被告知,如果万一看到或者碰到来访的美国人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

第二套是Φ40毫米、3毫米厚的两枚涂银铜质纪念章,图案正面分别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头像及两人的生卒年,背面图案分别是周恩来的题词“努力学习文化,为提高政治技

术水平”和邓颖超的题词“为培养德、智、体、美兼备的建设人才而不懈努力”。每次看到这两枚纪念章,我都会想起1970年在参加新华路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时,亲眼看到从我面前不到3米处驶过的敞蓬汽车上陪同西哈努克的周总理,当时他的脸色苍老,有很多寿斑,和平时照片上看到的形象判若两人。此后,周总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实形象就永远烙在我的脑海里。

第三套是Φ35毫米、2.6毫米厚的两枚涂金铜质纪念章,图案的正面分别是邓小平抗战时期和参加党的十三大时的胸像,像的上部是中国老百姓对邓小平最贴切的称谓:“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总设计师”。背面分别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和“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英勇奋斗”的题词。看到这组纪念章就会想起我亲历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祖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